

《1Q84》中的邪教隐喻与社会创伤书写——以奥姆真理教事件为参照

乔柏霖

吉林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长春，130117

摘要 1995年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村上春树《1Q84》的核心创作原型，当前学界对文本邪教元素的解读存在泛化问题，且忽视其与社会创伤的内在关联。本文以该事件为参照，剖析小说的邪教隐喻体系与社会创伤书写内涵。研究发现，小说以虚构邪教“先驱”镜像奥姆真理教，从组织架构、教义体系、精神操控手段完成邪教隐喻建构，并通过“小小人”“两个月亮”等核心意象，将批判上升至权力异化、人性扭曲与社会异化的哲学层面；同时从个体与集体双维度书写创伤，既刻画青豆、天吾等人物的创伤印记与救赎实践，也再现社会信任崩塌、秩序失范的集体创伤状态，并以情感联结与自我坚守探索出创伤疗愈的路径。本文厘清了《1Q84》中现实事件与文学隐喻的对应关系，挖掘出文本创伤书写的深层人文内涵，为理解村上春树创作从个体孤独到社会创伤的转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彰显了文学介入现实、反思社会问题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村上春树；《1Q84》；邪教隐喻；奥姆真理教；社会创伤；创伤书写

Received: February 4, 2026

Revised: March 3, 2026

Accepted: March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4,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1995 Tokyo subway sarin attack by Aum Shinrikyo serves as the core creative prototype for Haruki Murakami's 1Q84. Current academ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ult elements in the text suffer from overgeneralization and neglect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on to social trauma. This paper uses the incident as a reference to analyze the novel's cult metaphor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trauma writ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ovel mirrors Aum Shinrikyo through the fictional cult "Sakigake," constructing its cult metaphors acros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octrinal system, and methods of spiritual manipulation. Through core imagery such as the "Little People" and "two moons," the critique is elevated to a philosophical level concerning the alienation of power,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alien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novel depicts trauma

from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dimensions, portraying the traumatic marks and redemptive practices of characters like Aomame and Tengo, while also reproducing the collective trauma of societal trust collapse and order anomie. It explores pathways to trauma healing through emotional bonds and self-persistenc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real-life events and literary metaphors in 1Q84, uncovers the deeper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of the text's trauma narrative, offer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urakami's shift from individual solitude to social trauma, and highlights the unique value of literature in engaging with reality and reflecting on social issues.

Keywords Haruki Murakami; 1Q84; cult metaphor; Aum Shinrikyo; social trauma; trauma narrative

1995年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给日本社会留下深刻创伤，也成为村上春树《1Q84》的核心创作原型。文本以虚构邪教“先驱”为载体构建隐喻体系，细腻书写个体与集体创伤，反思邪教本质与人性救赎。当前学界对文本邪教元素解读泛化，忽视其与社会创伤的内在关联。本文以奥姆真理教事件为参照，采用文献研究、隐喻批评法，剖析邪教隐喻与创伤书写的内涵，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1. 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社会创伤的历史基底与村上创作的现实参照

奥姆真理教由麻原彰晃于1984年创立，崛起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失业率飙升、民众精神空虚、传统价值观崩塌的社会困境，为其滋生提供了土壤。该组织初期以“瑜伽修行”“心灵疗愈”为幌子吸引信徒，逐步发展为集宗教狂热、暴力恐怖、政治野心于一体的极端邪教，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其危害顶峰。

组织上，其实行严密层级专制管理，以麻原彰晃为绝对核心并将其神化，核心层设“法皇厅”，下设多级体系，部分底层信徒编入“特种部队”负责极端暴力行为。教义上，融合多宗教元素并恶意篡改，以“世界末日论”“暴力救赎论”“苦行主义”控制信徒，摧残其身心。

其发展分三个阶段：1984-1989年完善组织与教义；1989-1994年极端化扩张，涉足政治失败后策划多起暴力事件；1995年至今覆灭清算，沙林事件后核心成员被惩处，但残余势力仍有隐患。

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打破日本“高安全”认知，引发全民恐慌，导致地铁停运、社会秩序混乱，造成12人死亡、5510人受伤，大量受害者留下终身后遗症，还引发政府信任危机。深层创伤体现在个体与集体层面：受害者及家属多有心理创伤，信徒脱离组织后因社会歧视难以融入；社会信任体系崩塌，民众对宗教、政府信任骤降，日本社会陷入安全感缺失的困境。^[1]

该事件也成为村上春树的创作参照，他走访受害者并出版《地下》记录始末，其创作视角从个体孤独转向社会创伤，《1Q84》中的“先驱”组织镜像奥姆真理教，人物心理创伤呼应事件受害者，实现虚构与现实的深度联结，旨在揭露邪教本质、反思社会漏洞。^[2]

值得注意的是，奥姆真理教的组织形态、教义特征及其引发的个体与集体创伤，并非简单作为《1Q84》的背景素材存在，而是通过村上春树的文学转化，形成了“现实事件—文本隐喻”的对应关系。本文将以此为逻辑桥梁，具体剖析《1Q84》如何以“先驱”组织映射奥姆真理教的组织架构与教义乱象，如何以人物的精神困境与救赎实践，转化该事件带来的个体创伤与社会反思，实现历史现实与文学虚构的深度对话，为后续的文本分析搭建起清晰的逻辑关联。

2. 《1Q84》中的邪教隐喻：以“先驱”为核心的文本表征

2.1. 邪教组织“先驱”的隐喻建构与现实映射

村上春树以奥姆真理教事件为直接原型，在《1Q84》中精心建构了邪教组织“先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隐喻体系，旨在对现实中的邪教危害进行艺术化的批判与反思。

“先驱”的发展轨迹与奥姆真理教高度相似。它最初以一个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小型沙龙面貌出现，吸引了对现实感到不满、精神空虚的知识分子。^[3]这种看似无害的开端，隐喻了邪教组织往往以文化、灵性或互助团体为幌子进行初始渗透的普遍策略。随着其影响力扩张，“先驱”迅速蜕变为一个结构严密、控制严酷的邪教，成为神秘存在“小小人”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计划的工具，这映射了奥姆真理教从瑜伽修行团体演变为暴力恐怖组织的历程。

在组织架构上，“先驱”是对邪教专制本质的直白揭露。组织顶端是被称为“神”的“领袖”，其意志是绝对律令，信徒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容任何质疑。其下设有由“代言人”“评议员”构成的核心管理层，负责日常运作与意志传达。普通信徒则被编入严密的层级小组中，接受严格管控。此外，组织内还设有功能等同于奥姆真理教“真理军”（或称“特种部队”）的安

保部门，专职监视、镇压与报复。这种金字塔式的封闭结构，深刻隐喻了邪教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层级管理，系统性地剥夺个体自由，建立一种极权统治模式。

“先驱”的教义体系是其进行精神操控的核心工具，其扭曲与荒诞性直指奥姆真理教的教义内核。其核心主张“另一个世界”与“牺牲论”，宣扬现实世界的虚妄与痛苦，许诺一个唯有通过追随“领袖”、为组织奉献一切（包括财富、情感乃至生命）才能抵达的“美好世界”。这种通过制造二元对立（现实/彼岸）与生存恐慌来吸引信众的手段，与奥姆真理教的“世界末日论”和通过“修行”乃至暴力来“拯救”的逻辑如出一辙。教义极力神化“领袖”，将其塑造为连接两个世界的唯一中介，从而通过狂热的个人崇拜，彻底瓦解信徒的独立人格与批判能力。

小说细致描绘了“先驱”对信徒实施的全方位精神控制手段，这些手段精准再现了包括奥姆真理教在内的邪教常见操控方法：① 思想驯化：通过定期的教义学习、集体冥想，反复灌输极端理念，否定并替换信徒原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② 人身禁锢：将信徒与外界社会隔离，限制其行动与通讯自由，使其生活在封闭的“修行”环境中，依赖组织获取信息与生存资料。③ 奖惩机制：建立一套严密的规训体系，对顺从者给予精神褒奖（如“领袖”接见）或地位晋升，对质疑反抗者则施以体罚、精神虐待乃至更严厉的惩罚，以强化服从行为。④ 心理与药物操控：利用反复的心理暗示（如“脱离即毁灭”）制造恐惧，并疑似使用含有精神药物的饮食来干扰信徒的正常认知与情绪，使其更易被操纵。这些手段共同构成了一个摧毁个体意志、制造绝对依附的精神牢笼。

2.2. 文本核心意象的邪教隐喻解读

除了对“先驱”组织的直接刻画，村上春树还创造了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群，它们与邪教隐喻深度交织，极大地拓展了批判的维度与哲学深度。

“小小人”与“空气蛹”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组意象。“小小人”是一种无形、神秘却拥有巨大操控力的存在。它们隐藏在现实世界的背面，不仅是“先驱”组织的真正操纵者，更是“1Q84年”这个异化世界的秩序制定者。其“微小”与“隐蔽”的特性，隐喻了邪教势力（或更广义的邪恶力量）往往潜伏在社会肌理之中，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施加影响；其强大的“操控力”，则直指以麻原彰晃为核心的奥姆真理教领导层，如何在幕后策划、指挥了一系列震惊社会的暴力事件。“空气蛹”作为“小小人”的造物，是邪教精神控制过程最形象的象征。它透明无形，能包裹人的“意识”与“影

子”（象征自我的本质与独立性）。一旦被其包裹，个体便会丧失自我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成为被操控的傀儡。这一意象生动地隐喻了邪教如何像编织一个无形的蛹一样，逐步包裹、窒息信徒的独立精神，最终完成对其人格的彻底异化与夺取。

“两个月亮”与“1Q84年”则共同构建了邪教影响下的社会异化图景。“1Q84年”是一个与现实世界（1984年）平行却又迥异的时空。它表面看似正常，内核却充满了混乱、暴力、冷漠与信任危机。这里的“Q”既寓意“Question”（疑问），也暗示“Queer”（怪异），精准地概括了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与不确定性。它直接映射了奥姆真理教事件后日本社会的集体心理现实：表面的秩序虽然逐渐恢复，但深层的信任纽带断裂，社会氛围中弥漫着难以驱散的恐惧、疏离与精神迷惘。“两个月亮”是“1Q84年”最显著的视觉标志，也是最强烈的隐喻符号。在正常世界中，单一的月亮象征着秩序、恒定与诗意的美好。而两个月亮的并存，打破了这一自然法则，象征着正常世界的根基已被动摇，社会陷入了价值混乱、认知对立与精神分裂的状态。^[4]它既隐喻了邪教所代表的异化力量与正常社会的对抗，也象征着事件后日本社会与民众内心难以弥合的分裂与矛盾——渴望回归“一个月亮”下的平静，却无法摆脱“另一个月亮”投下的阴影。

2.3. 邪教隐喻的核心内涵：对权力、人性与社会异化的批判

《1Q84》中的邪教隐喻，其深刻性在于它超越了具体事件的复现，上升为对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的哲学批判。

首先是对权力异化的批判。在小说中，“先驱”的“领袖”与背后的“小小人”，通过操控教义与实施精神控制，将权力异化为绝对的个人统治工具。这种权力不再有任何公共服务性或道德约束，完全服务于掌控者的私欲与意志，用于压迫、剥夺甚至毁灭个体。这直接映射了麻原彰晃如何将宗教领袖的权力异化为实现其政治野心和施行恐怖统治的工具。村上借此批判了任何形式的、脱离监督与制衡的绝对权力，指出其本质是反人性、反社会的，是滋生邪教式统治的温床。

其次是对人性异化的深刻揭示。“先驱”的信徒在系统的精神操控下，经历了人性被彻底扭曲的过程。他们从拥有正常情感与判断力的个体，异化为冷漠、麻木、盲从，甚至能够参与暴力的“组织部件”。村上春树并未将他们简单描绘为恶人，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原本是寻求精神寄托的迷茫者，却在邪教的陷阱中被剥夺了自我，沦为牺牲品。这批判了邪

教反人性的本质，也反思了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在物质丰裕却精神空虚的困境下，人性脆弱而易被极端意识形态俘获的危机。

最终，批判指向了社会异化。“1Q84年”就是社会全面异化的文学模型。在这里，人际关系原子化，信任体系崩溃，暴力替代法律，意义感普遍丧失。这不仅是奥姆真理教事件后日本社会创伤的写照，更是对全球后现代社会的预警：高速发展的科技与资本逻辑可能加剧人的孤独、社会的冷漠与价值的虚无，从而为各种极端思想与组织的滋生提供土壤。村上通过这一隐喻，呼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重建人际的纽带与社会的伦理，以抵御全面的异化。

3. 《1Q84》中社会创伤的书写方式与内涵表达

3.1. 个体创伤的书写：人物命运中的创伤印记

小说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细腻而深刻地书写了邪教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异化力量对个体造成的深度创伤。

青豆的创伤具有双重性。她的童年创伤源于一个狂热的宗教家庭，父母的冷漠与强迫性宗教仪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身心伤疤，导致她成年后孤僻、多疑，难以与他人建立信任。这一背景设定，使她与邪教受害者的身份产生了先天共鸣。成年后，她选择以刺杀“先驱”成员的方式进行复仇，这既是她对邪教直接施加的暴力反抗，也是她试图掌控自身命运、宣泄内心痛苦的极端疗愈方式。她的孤独、坚韧与对爱的执着追寻，代表了创伤个体在毁灭性打击后顽强的求生与救赎意志。^[5]

天吾的创伤则更多是精神性与情感性的。压抑的童年使他长期处于自我认同危机与深刻孤独之中。写作数学教材与小说，成为他构建秩序、寻求自我价值、逃避现实痛苦的唯一途径。他的创伤代表了那些并未直接遭受物理暴力，却被事件阴影所笼罩、陷入存在主义迷茫的普通人的精神困境。他与青豆共同构成的“寻找-重逢”叙事线，象征着创伤疗愈中“情感联结”与“相互确认”的核心重要性。

即便是“先驱”的信徒，包括领袖的女儿深绘里，也被刻画为创伤的承受者。他们并非天生的恶魔，而是在精神脆弱时被组织的教义与手段捕获、控制，最终自我被异化与剥夺的受害者。他们的麻木、沉默与内心的挣扎，深刻揭示了邪教精神控制对人性的摧残之深，即便肉体脱离组织，精神的创伤与异化也可能伴随终身。这使小说的创伤书写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充满了复杂的人文关怀。

3.2. 集体创伤的书写：社会层面的异化与困境

村上春树将创伤书写从个体层面扩展至整个社会，描绘了“1Q84年”所代表的集体创伤状态。

这种集体创伤首先体现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氛围：普遍的冷漠、疏离与恐惧。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基本的交流与关怀，如同生活在孤岛；公众场所充满了无声的、焦虑的个体。人们对“小小人”的操控、“空气蛹”的威胁感到无形恐惧，对整个世界的真实性与安全性产生根本性质疑。这精准再现了重大社会危机（如恐怖袭击、邪教事件）后，公众中弥漫的不安全感、信任感丧失与集体性焦虑。

其次，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崩塌。在“1Q84年”，信任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人与人之间（邻里、同事）、民众与社会机构之间（尤其是对政府维护秩序的能力）、甚至个体与自身感知之间的信任都严重受损。这种全方位的信任危机，是集体创伤最深层的核心，它瓦解了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黏合剂，导致社会联结的断裂与共识的消散。

最后，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先驱”组织可以公然实施犯罪而不受制裁，街头暴力事件频发，公共秩序陷入混乱。这隐喻了当邪恶力量（邪教）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当社会集体心理防线崩溃时，法律与道德等维系秩序的框架会变得脆弱甚至失效。创伤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也能外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失序。^[6]

3.3. 创伤书写的核心意图：救赎、反思与人文关怀

村上春树书写创伤，其最终目的并非渲染绝望，而是为了实现文学的疗愈与警示功能。

其一是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通过将个体创伤与“先驱”的恶行、社会的异化紧密联系，小说迫使读者反思奥姆真理教事件乃至类似社会悲剧的根源：不仅仅是几个邪恶领袖的出现，更深层的是社会土壤中存在的权力异化、人性困境与信任危机。小说批判了邪教的反人类本质，也批判了催生邪教的、冷漠异化的后现代社会本身。

其二是探索救赎的可能路径。青豆与天吾最终在“另一个世界”（的重逢与结合，是小说给出的最重要救赎方案。它象征着：个体自我的坚守与觉醒：即便身处绝境，也不放弃对爱、真实与美好的追寻。人际情感的联结力量：深刻的爱情、理解与陪伴，是治愈创伤、对抗异化最强大的武器。这一

结局赋予了小说希望的光芒，表明创伤或许无法完全抹去，但通过内在力量与外在联结，个体与社会仍能找到继续生存的意义。

其三是彰显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村上春树以平等的视角观照笔下的每一个创伤承载者——无论是受害者青豆、迷茫者天吾，还是被异化的信徒。他理解他们的痛苦，揭示他们的困境，并最终给予他们救赎的希望。这种关怀延伸至对整个社会命运的忧思，呼吁读者关注精神世界的健康，警惕权力的滥用，珍惜并主动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联结，从而共同抵御那些试图将人异化为傀儡的“小小人”力量。^[7]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1Q84》是村上春树运用高超文学技艺，对奥姆真理教事件及其引发的深远社会影响进行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叙事回应。小说通过构建“先驱”组织这一核心邪教隐喻，以及“小小人”“空气蛹”“两个月亮”等富有哲学意味的意象群，不仅精准映射了现实邪教的运作机制与危害，更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权力异化、人性扭曲与社会冷漠这些更为普遍的现代性顽疾。同时，小说通过对青豆、天吾等人物个体创伤与“1Q84年”集体创伤状态的细腻书写，生动再现了重大社会事件后人们的精神困境，并最终通过爱情与联结的主题，为创伤的疗愈提供了文学的启示与希望。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审视人类精神处境、呼吁守护个体自由与尊严的寓言，彰显了文学介入现实、疗愈心灵的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 [1] 黄绿萍.二十余年来日本社会对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反思[J].科学与无神论,2023,(05):73-83.
 - [2] 郝嘉凯.《地下》和《1Q84》中“恶”的意象研究[D].长春工业大学,2023.
 - [3] 胡小洁.村上春树作品《1Q84》人物形象特征[J].名家名作,2022,(08):37- 39.
 - [4] 李锐.主体·意象·结构——村上春树小说《1Q84》的多元叙事特征[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39(10):132-136.
 - [5] 胡峥.论《1Q84》中的童年创伤与自我救赎[J].今古文创,2021,(44):25-26
 - [6] 赵静.村上春树文学的历史叙事[D].黑龙江大学,2018.
-

[7] 吴丽艳. 《1Q84》中的善恶平衡及村上春树的忧患意识[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7(12): 38-40.